

太公兵法之研究

——本文主為研究太公六韜一書而作

徐培根

引言

太公兵法，計有六韜、三略和陰符經三種，流傳至今已歷三千一百六十餘年，為中國現存古代典籍中最高古的兵學書籍。在此三千一百六十餘年中，因流傳方法之不同，文字書法之變遷，各代之記載各有不同。班固所著漢書藝文志裏，載有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共二百三十七篇。又同志儒家類另有周史六略六篇，唐顏師古註稱：「周史係春秋時代周惠王襄王時人，一說是戰國時代周顯王時人。說即韜字。六說即今之六韜也。」隋書經籍志兵家類裏，却祇載有太公六韜五卷，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陰符經一卷，太公兵法六卷，黃石公太公三略三卷，而沒有漢志所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舊唐書經籍志兵家類裏載有太公陰謀三卷，太公六韜六卷，黃石公三略三卷，新唐書藝文志所載與此相同。宋史藝文志則載有六韜六卷，朱服校定太公六韜六卷，三略三卷，陰符二十四機一卷，又吳章註陰符三卷。明史藝文志載劉寅七書，內有太公六韜三略，列於兵家，而陰符經則列於道家。由於以上所述三千一百六十餘年來之輾轉流傳，各書之名稱篇數各有不同。於是一般文人們懷疑諸書都是後人的偽造，議論紛紛，頗使讀者心中發生甚大的困惑。最近中國大陸的考古團體在山東省臨沂縣銀雀山的漢墓發掘中，得到漢代竹簡四千九百多枚，內有六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管子，墨子等書，其中六韜等書，與傳世之今本大略相同。據其報告，臨沂縣銀雀山的兩座漢墓，係在西漢武帝初年（約在紀元前一八年前後）所埋葬（註）。由此可以證明六韜等書，在漢代初年已有定本，前述顏師古所言並不虛妄。我們現在正從事於整理我國古代文化典籍之際，對於太公姜尚所著六韜、三略和陰符經各書，加以整理和考證，藉以祛除讀者心理上一種真偽難分的迷惑

，確是我們在復興中國文化運動中一項急要之事。

其次，太公姜尚所著的六韜、三略和陰符經三部書，一般人都稱它為「太公兵法」。但細按其內容，涉及政治、人民心理、以及經濟等項，範圍頗為廣泛，與孫武、吳起、孫臏等所著純軍事性的兵法頗不相同，此乃由於兩者所處的時代形勢有所不同之故。孫武吳起孫臏等所研究之戰爭，是兩個敵對國家間之純軍事性戰爭，而太公姜尚所研究之戰爭，乃是以西周蕞爾小國來推翻殷商王朝的革命戰爭。兩者形勢迥不相侔，所以指導戰爭的努力和方法，亦各不同。明白這個道理，則對於太公的著述，當有更確切的感覺和更深一層的瞭解。

太公的著述，距今已有三千二百六十餘年，其間有文字書法的變化，撰寫語言的變遷，並有漏誤錯簡諸端的謬誤。使讀者有難讀難解之處。但是讀者如果能夠體會其精神，領悟其要旨而加以靈活運用，則雖是數千年前的陳言，仍有助於今日之建功立業以有益於國家也。

註：見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大陸廣播，略稱：「不久前，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大批竹簡。銀雀山漢墓的時間，相當於西漢武帝初年，距離現在兩千一百年，在兩墓中出土的竹簡，一共四千九百多枚。從初步整理的結果來看，包括六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墨子、管子、晏子等大量秦漢以前古代書籍。其中孫臏兵法這本書，失傳已經一千七百多年，而這次發現的孫臏兵法的竹簡有四百四十多枚，字數在一萬字以上，孫子兵法等書，字句和今天傳世的本子略有不同，並且發現了一些重要的佚文，佚文就是散失的文章。」

第一章 古代學術流傳的方式

第一節 生存技術和經驗的積累

文化爲人類生存方法的積累，生存則賴戰鬥以維護。我國古書上有句話說：「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這就是說，一個民族能夠生存於世界，它必須具備有生存的方法和戰鬥的技能。我們試想：原始人類生活在原始的洪荒世界裏，於縣長之數十萬年之歲月中，假使沒有具備生存的方法和戰鬥技能，可能已爲猛獸毒蛇所吞噬，或爲其他民族所殺害，自然無法生存存延到於現代。由此可知生存於現代的各民族，其各具備有生存方法与戰鬥技能，乃是無可置喙之事。

前代經驗的積累，爲古代學術的根源。至於所積累的經驗豐富或貧乏，則視其傳授方法的不同而有差異。大抵擁有文字的民族，因有所遺留的文字記錄爲準據，縱使多歷年代，仍能保持它原有的意義，累世相承而不變。至於沒有文字的民族，祇能靠着口頭傳授，則往往因年代久遠而致模糊與遺忘。所以有文字的民族，它的經驗積累，較之沒有文字的民族爲多；文字發明較早的民族，也較文字發明較晚的民族爲多。此乃爲自然之理。

第二節 中國古代學術與經驗的傳授

我國歷史，可以向上追溯到五千餘年，應該歸功於黃帝時代（紀元前二六九〇年代）蒼頡的製造文字（註一）。在此以前的上古時代，我國已有結繩記事和伏羲氏創造書契的記載（註二），但終因所代表的符號不多，不能作廣泛的使用。迨至蒼頡製造文字，他以象形、會意、假借、指事、轉註、形聲六種方法製成文字，使能代表各種意義，因之文字的使用範圍擴大，遂以啓開了中國文化的黎明時代。

不過在那個時代裏，我們的文化還是處在石器與銅器混用的時代，文字書寫工具是用石刀與銅鑄；而初期所造成的文字結構複雜，書寫困難。因之當時所記入典冊的文字，祇能記載極簡略的主要事項和年月等，所以我們現在所保留下來的古代典籍、文字都是簡略難懂，此可於我國商周時代所遺留的彝器和鐘鼎上的銘文，以及商丘出土的甲骨文中之可以見之。在此一時代裏，我國雖然已經有了文字，但因記載簡略難懂，所以典籍的詳細內容，還是要靠老一輩有研究的人加以口頭解釋，纔能瞭解它的真實意義。在此一時期，學術和經驗的傳授，我們可以稱之爲文字記錄和口頭傳授並用的時代，大概自蒼頡創造文字之時起（紀元前二六九〇年代），直到春秋時代（紀元前七七〇年代）鐵器使用和書寫工具刀筆的發明之時止

，約爲一千九百餘年。我國古代有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說（註三）。漢朝孔安國註解說：「三墳五典，係記三皇五帝之事，八索係記伏羲氏的八卦，九丘係記九州的風物。此處所謂典與索：典係用繩索穿繩竹木簡使其成冊之意；索係在結繩時代伏羲氏解釋八卦的繩索符號。至於所謂墳與丘，乃是古代收藏典籍的地方。因爲我國中原，黃河常有水災，收藏典籍必須選擇高丘陵阜之地開闢窟穴，並且還要用土掩蓋以防水火的侵襲。我們看殷朝的甲骨文，藏於商丘的墓塚中（註四）；春秋戰國時代晉國和魏國的歷史記錄「竹書紀年」藏於魏襄王的墓塚中（註五）；而敦煌的石室，收藏漢代唐代的典籍甚多（註六）。古人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千秋」，就是古代收藏典籍的方法。由此可以想見我國古代學術傳授的久遠，和其積累的深厚了。

春秋時代（紀元前七七〇年至紀元前四〇三年）我國鍊鋼術的發明和鐵器的普遍使用，給予中國文化開啓了一個新紀元。中國之有鐵器，究竟開始於那一個時代，歷史上沒有明確的記載。在現存的殷商和西周時代所遺留的古物中，以及在商丘和各地的考古發掘中，却沒有找到一點可以證明有鐵製器物遺留的痕跡。殷墟甲骨文關於金屬祇有錫字而沒有鐵字。尙書禹貢篇裏雖有「厭寶鐵銀鑊磬」的記載（註七），但禹貢篇的寫定，據考證係在春秋末期，在那時鐵器已盛行於全國各地，所以不能作爲春秋以前已有鐵器的佐證。至於在春秋時代，則有很多的關於使用鐵器之文字記載。管子小匡篇有「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櫛，試諸土木。此處所稱的美金即爲鋼，而惡金爲鑄鐵。齊國當時並設有「鐵官」一種職位，以管理鐵器之生產與分配。管子海王篇說：「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軹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管子地數篇且說明鐵鑄之偵察法：「山上有積者，其下有鐵。」墨子書中也有許多關於鐵器的記載。它的備城門和備穴門兩篇中說：「門植關必環錮，以金若鐵鑄之；門闌再重鑄以鐵。」「竈有鐵鑄，藉車必爲鐵纂。防穴以鐵鎖懸穴口；穴爲鐵鉢金與扶林，長四尺；爲鐵鈞鉅，長四尺。」荀子議兵篇說：「楚人宛鉅鐵鈹（矛），慘如蓬蒿。」吳越春秋書中有記載干將莫邪夫婦鍊鋼製劍之事：「干將，吳人；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莫邪斷髮剪爪投於爐中，

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由此可知在春秋時代鐵器已普遍使用，而鍊鋼技術也已有相當的進步。我們看到殷商和西周時代中，對青銅器的冶鍊已達到了高度的精緻，則於後來的三四百年之春秋時代，進而冶鍊鋼鐵以製造鐵器，自為可能之事。

鐵器的使用，因而促進春秋時代社會經濟的繁榮。在農業方面，因鐵製耜鋤耨耨鉞的使用，農民可以施行深耕，糧食的生產大為增加。在工業方面，因鐵製刀鋸斧鑿的使用，使工業品益為精緻堅固，而生產量也因而增高。在交通方面，車輛因使用鋼鐵工具來製造，較之使用青銅器工具製造的車輛堅固耐用，運輸能力增進而使貿易大為發展。社會經濟繁榮，自然使人民生活豐裕。人民生活豐裕，人人乃有餘暇的時間以追求知識，此在石器或銅器時代人民終日胼手胝足以謀求溫飽的狀況下是難以做到的。

在另一方面，中原在夏禹時代有一萬餘國（註八），至商湯時代有三千餘國，武王滅殷，封一千二百餘國（註九），至春秋初期，在史冊中有記載的尚有一百六十餘國。及至春秋末期，祇剩下燕齊中山晉魯衛宋鄭陳蔡秦楚吳越等十餘國，其餘的都被強國兼併而滅亡了（註十）。在這些被滅亡的國家中，有許多，其先世在過去的時代裏，對社會民族曾建有赫奕的功勳和甚大的貢獻，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的後裔所建之國等。此等國家雖已滅亡，但其族中的長老遺民，常保有其祖先所遺留的遺物，文字記錄以及口頭傳授等。前面所述的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大部分都是靠此等人物所保留下來的。春秋時代既以使用鐵器而使社會經濟繁榮，人民有餘暇時間來尋求知識，則尋訪此等人物作為老師以教育其子弟，乃極為自然之事。我們看在此一時代裏，孔子有門徒三千人（註十一），而法家管仲李悝，道家老聃莊周，墨家墨翟禽滑釐，兵法家孫武吳起，醫學家和緩扁鵲，工程家魯班，音樂家師曠師曠等，個個都有他們甚多的門徒，就是這個道理。此諸位老師，大部分都是貴族名門的後裔，積有豐厚的家學淵源和秘傳，所以能以專門的學術教授其學生。又此諸位老師，都是當時聰明絕頂的人物。他們不僅能謹守其家學秘傳而加以發揚光大，還能遍讀各地舊藏的典籍加以融會貫通，創立了一家一宗派的言論，蔚然成爲一家一宗派的導師。

促進春秋時代文化和學術的發皇，其另一重要因素，爲文字書寫工具「刀筆」的發明。筆的古字爲聿（註十二），乃是以手執筆而書寫的形象

文字。在銅器時代，筆的尖鋒是用青銅製成，其形狀像尖銳的鑽子，用它的尖鋒刻寫文字於版上。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殷墟甲骨文，都是用此種鑽筆所刻寫的，所以筆畫都非常瘦硬。到了春秋時代鋼鐵既已發明，乃有以鋼鐵製成尖鋒的刀筆出現。刀筆一名詞，辭源裏解釋說：「古簡牘用竹木，以刀爲筆，故曰刀筆。」大抵在古代的官署中，常設有所謂「刀筆吏」以專司刻寫簡牘之事。戰國策裏有趙國守相司馬對趙悼襄王說：「臣少爲秦刀筆。」而漢代開國功臣蕭何，也曾做過秦朝丞相府的刀筆吏（註十三）。

文字既用尖銳的刀筆來書寫，書寫工作極爲便利而快速。前面所述的諸位老師、學人，以及他們的學生們，爲了研究學問，得到這樣新的書寫工具，真是得到了前代所沒有的幸福和便利。他們於是：有的由老師口述而由學生筆記寫作以成書；有的爲整理舊存的典籍和各種口頭傳授的資料，加以鑑審而寫定，使古籍成爲一種有系統有組織足以供後人徵信的典籍；有的，因爲這些學人們博讀了許多古代典籍和觀察了千餘年來的世事變化，領悟了古今興衰存亡和盈虛消長的道理，因而發見了哲理、治道、倫理和民生各項原理原則，撰寫了許多有體系的著作以供讀者。孔子所作的論語。孟軻所作的孟子，管仲所作的管子，孫武所作的孫子，吳起所作的吳子等，書裏篇首冠以「某子曰」的，都是由他們的學生記錄所寫成的，屬於第一類。孔子所刪定的詩、書、禮、易傳和春秋；諸子對於古代人物事蹟或著述的寫定，如三皇五帝的記載，國語、左氏傳，以及太公的六韜、三略，醫學的黃帝內經素問等，屬於第二類。老聃所作的老子，莊周所作的莊子，墨翟所作的墨子等，都是具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和完整的體系，屬於第三類。以後到了戰國時代（紀元前四〇三年至紀元前二二一年），因爲列國的國君，都爲謀求富國強兵而招納天下賢士。於是處在草莽田野的才智之士，個個都搜求古代典籍，著書立說以求有所建樹。遂以造成諸子百家，衆論齊鳴，成爲我國文化早期的黃金時代。後漢班固所著的漢書藝文志，敘述漢代所搜集的書籍共爲三十八種，其中除小說家和詩賦家外，計與學術有關的著作共爲三十二種，四百七十九家，一萬零四百七十九篇。我們發見其中二百六十七家，五千三百零一篇，係屬於春秋戰國時代所寫成。而此諸家的著述，個個都卓然不羣，有獨立創造的見解，的確可稱爲空前的盛況了。

由於以上所述，可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許多春秋以前的古代典籍，都不是當時的原始記錄，而是由春秋戰國時代學人們，根據古代所遺留的簡略典籍和前代口傳資料所寫成。我們就尚書一書而論，它是大家一致所公認的一部古書。但是在堯典篇第一句「曰若稽古帝堯」，在這裏加上「稽古」二字，是表示作者追溯前人事功的意思，可見此書不是帝堯時代的原始記錄，而是由刪定詩書的孔子所寫成。像尚書那樣的古書，尚且是在春秋時代所寫定，其他的古書，自然也無法擺脫此種事實而有例外。

其次，那些整理古代典籍的學人，當其寫定古籍之時，自然是力求忠實於史事以供後人的徵信。但當其選擇資料之際，自不免夾雜有其個人的思想和主見。譬如尚書堯典篇裏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一段話，這在竹書紀年裏是沒有這樣的記載。我們細考這段話的意思，是和孔子「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是相同的。在這裏究竟是孔子根據古代史料所寫？抑或是孔子以其自己的思想來推演帝堯的治道而寫呢？這是很難加以考證確定的。因此在那些學人們所整理過的古代典籍裏，或者夾雜有他們自己的思想在內，或者使用了他們當時所習用的語言文字等，那是很難避免的事。但是有些人，因為不明瞭古代寫書的情形，在古代典籍裏發見有上述各種可疑之處，就冒然認為它是後人的偽作而加以蔑視，這就近於吹毛求疵之見，因噎而廢食了。

以上為我國古代學術和經驗傳授的概略，而兵學的傳授即為其中之一項。所以上述各點，也可為我們研究太公兵法之一助。

第三節 中國古代兵學的傳授

一個民族為生存所採取的自衛方法的戰鬥技術，若將其上世的經驗積累寫為典籍，則成為兵學典籍。我國民族定居於中國北部黃河的兩岸，歷史其為古遠，據傳說上所記，概已有數十萬年之久（註十四）。但在此同一區域內，同樣也有其他民族雜居其間：在北方及東北有狄族；北方及西北有戎族；西方有羌族；東方有夷族；南方有苗族、黎族和荆蠻；東南方有越族等。在悠長的宇宙歲月中，這些混處於同一地區的各民族之間，以及各民族內部各民族之間，自然時常會發生互相衝突或戰爭之事。易經繫辭裏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尚書載箕子陳洪範八政（八項施政），

八曰師（軍事施政）。可見我民族的先世聖賢，早已注重戰鬥用的兵器，攻防警戒的戰鬥技術，和出師用兵的行政設施。史稱黃帝修德振兵，常以師兵為營衛，與炎帝戰於阪泉，擒殺蚩尤（九黎族之長）於涿鹿之野（今河北省涿縣），北逐獯粥（戎族），南平苗蠻。在堯舜的時代裏，南方的苗族頻頻內侵，帝堯迭次用兵征討；舜且死於征苗戰爭的道途中，史有舜崩於蒼梧（今湖南省零陵縣）的記載（註十五）。在夏商的兩代中，夏禹迭次征苗，商代有武丁伐土方（狄族）和鬼方（戎族）之戰，歷時四年（紀元前一二九六年至紀元前一二九三年），為商代抵禦戎狄內侵之重要戰爭（註十六）。周代初興，則有武王伐殷牧野之戰（紀元前一一二二年），隨後有東征、伐奄、伐獯粥（戎族）、伐徐、伐楚之戰。到了幽王時代，犬戎內侵竟將西周滅亡（紀元前七七一）。平王東遷洛邑，入於東周時代。其時王室的威權衰落，荆楚北侵，戎狄南移，中原形勢，岌岌可危，於是乃有齊桓晉文尊王攘夷之戰爭，隨後有晉楚齊秦爭霸之戰爭。到了戰國時代，七國並立，大小戰爭，更是不計其數。由於以上的戰爭記錄，可知我民族是在無記數的戰爭中生存下來的，也是經過無記數的戰爭鍛鍊後茁壯長大起來的，因此也得到了無記數的戰爭經驗和它的積累。

班固所著漢書藝文志，敘述兵家所著的典籍部份說：「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據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漢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共為五十三家，七百八十三篇，圖四十六卷。」我們細考其中除漢代著述外，屬於春秋戰國時代之著述共為四十二家，六百三十八篇，圖四十六卷，但班志將司馬法列入禮家；將荀子議兵篇、周史六韜篇列入儒家；將伊尹、太公權謀言兵、管子、鶡冠子、黃帝君臣、力牧各篇列入道家；將商君書列入法家；將伍子胥、子晚子（齊人，好論兵）、尉繚子各篇列入雜家；將蘇秦、張儀、龐煖（燕將）各篇列入縱橫家。這些列入他家的書籍，其內容都與軍事有關，若將其加入兵家，則共有五十八家，一千三百五十一篇，圖四十六卷，足可見春秋戰國時代所著的兵學典籍數量之多。

我國古代兵學的傳授，和其他學術的傳授，方法不同。其他學術可以廣收學生，公開講授；而高深兵學的傳授，却是祇收少數素質極高的學生秘密加以傳授；而且若是得不到適當的人，寧可秘而不傳。因為兵兇戰危

，如果傳授不得其人，小則可以造成變亂，為害於國家，大則可以傾國覆軍，陷民族於危亡，是由於高深的用兵學，含有權變詭譎之謀，隱微變化之方，所謂帷燈匣劍，秘密不使人知，因此可以出奇制勝，克敵奏功，老子說：「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高深用兵學，乃是國家剋制敵人的利器，端然不可以輕率示人。從前漢代初年，呂后欲與諸呂族為亂（紀元前一八八年），他們先使人盜取王室秘府所藏的兵法，想藉此作為用兵的準繩（註十七）。唐代太宗李世民（在位紀元六二七年至六四九年），曾命李靖傳授侯君集兵法，李靖祇教他將帥一般用兵的方法。侯君集認為李靖隱匿了高深的用兵學不教，因之向唐太宗告密，說：「李靖不傳授他隱微的高深用兵學，將來他可能會造反。」唐太宗乃責問李靖。李靖對說：「方今中國國內已太平無事，我之授給君集的，使他學了足以制服四境異民族，為國家安寧而建立功業。君集想要學高深的用兵學，乃是他自己要想造反耳。」以後侯君集因貪黷罪失職，心中快快不平，最後與廢太子承乾密謀作亂，事機敗露，終於以叛亂罪被判死刑和滅族（註十八）。古代兵學家所以不輕易傳授高深用兵學於別人，就是這個道理。李靖終於沒有將他的高深隱微的用兵學傳給別人，而祇是留下了與唐太宗問答的兵學鱗爪，記錄下來成為「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一部書。漢代張良將死時，他深恐黃石公所授太公三略一書流傳人間，為害於國家，乃遺言將此書藏於棺中而葬（註十九）。所以中國的古代兵學，常因天下太平，或是不得其人而不傳授，以致於失傳。又古代的高級將領或統帥，通常不將他所運用的戰略告知別人，以免為敵人所偵知而失去其效用。太公姜尚說：「鷺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有將動，必有愚色。」（註二十），這就是說兵機以秘密為主。所以古代將帥多不自己著書，而其所遺留下來的奇謀妙計，密策秘籌，大部份都是由他們的幕僚所寫成。譬如善於用兵的如德國非得力大王（Friedrich II der Gr. 1712—1780）和法國拿破崙（Bonaparte Napoleon I. 1769—1821），他們的戰略理論，都是由克勞色維慈（Clausewitz 1780—1831）和約米尼（Jomini 1779—1869）等人依據他們的戰史所寫出。而我國太公的六韜三略等書，也是由他的記言記事史的官記錄而成。漢書藝文志裏載有春秋以前的許多古代兵學典籍，這些書原來都是秘藏在王朝的秘府裏不為外人所知曉，一直到了周幽王時代犬戎攻周，焚燒鎬京（係西周首都在今陝西

省長安縣西南），官員奔散，纔零星流散於民間。到了戰國時代，各國諸侯都力求富國強兵，軍事學術，始為各方所重視而加以研究。所以到了漢代有如許多的兵學書籍出現於當時。以上為古代兵學流傳的概略，而太公六韜三略諸書，也是這樣留傳下來的。

第二章 太公兵法的研究

第一節 太公所處的時代

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世在堯舜時代裏會做過四嶽之官，對於呂，其子孫乃以呂為姓，因此姜尚亦叫做呂尚或呂牙。（註一一）太公生於殷商王朝的末紀，其生年月日史無記載；其死，據日本竹書紀年載在周康王六年（紀元前一〇七三年）；史記稱太公之卒百有餘歲（註二二）。又據尉繚子武議篇所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殷朝王都，今河南省淇縣），賣食盟津（即孟津今河南省孟縣南），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周國國君，姓姬名昌，文王係後人追尊的諡號），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定天下。」（註二三）今假定太公之遇文王為七十二歲，是年為殷紂王之十五年（紀元前一四〇年）則其出生約在殷王庚丁之六或七年（紀元前一二二二年）。史記書上稱太公早歲曾在殷室王朝做官，其時殷室王朝的君主為帝武乙，帝太丁，帝乙，都是碌碌無能之君。一直到了紂王即位（紀元前一五〇四年），其時太公已是五十七八歲的壯年了。以太公的才幹和熱誠，在當時想已做到相當高的職位。紂王是一位予智自雄、剛愎自用的君王。他所施行的暴政，自然為太公所反對。尉繚子稱諫其主而不聽；孟子稱太公避紂於東海之濱，足見太公曾對紂王作直言的規諫，而為紂王所痛恨。太公因此脫離殷室王朝，逃居於東海之濱。最近學人劉震慰撰著「虞山奇觀」一文，引江蘇省常熟縣志說太公會經營耕釣生活於常熟縣城西側的尚湖湖畔，尚湖即因太公居留而得名（註二四）。想當時周文王的大伯父泰伯居於江南的梅里（今江蘇省無錫縣東南梅里鄉）自稱句吳國，二伯父仲雍居於虞山（今江蘇省常熟縣），兩人都為當地人民所愛戴（註二五）。太公逃離中原，來此相依，當為可能之事。但其時泰伯仲雍均已死亡，其後嗣多無傑出之才，而太公悲天憫人之壯懷，未能自己，因此重又回到中原以觀察形勢。這就尉繚子所說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人人譏為狂夫的時候了，太公目見當時紂

王的暴政，較前更甚，人民的痛苦也更益加深，而走遍天下諸侯，却找不到有任何解救之方，於是乃以垂老之年，西奔西岐與周文王相見，其時正是文王從羗里之囚釋放而歸，想有所作爲的時候。孟子稱太公與伯夷，爲天下之二大人，足見太公在中原聲望的隆高。而文王一見了太公，就說「吾太公望子久矣！」傾談之間，遂拜以爲師，稱爲太公望，相與謀議傾覆商政以解救人民疾苦之事（註二六）。以上爲太公壯年時代在中原之活動情形以及西入西岐之概略。

至於當時全國的形勢：殷商王朝，自成湯開國（紀元前一七六六年）以來，統治中國已六百餘年。孟子書裏對殷商王朝之政治情形有以下的敘述：「由湯至於武丁（即殷高宗，在位自紀元前一三二四年至紀元前一二六六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註二七）此爲殷商王朝統治中國六百餘年之全般情形，以及紂王即位初期之賢臣良相。不過到了紂王掌政以後，紂王是一個聰明自肆之人。史稱其「資辨捷疾，聞見甚敏，膂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寵愛妲己，惟其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又厚加賦稅，以實鹿臺（紂王宮）之財，盈鉅橋之粟。作酒池肉林，使男女保（赤身露體）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又作重辟（大辟之刑）與炮烙之刑，殺九侯鄂侯，囚西伯姬昌（即文王）於羗里（今河南省湯陰縣北）。……」（註二八）總之，紂王乃是了智自雄，剛愎自用，恣意淫樂，任性殺戮的一代暴君。他又罷斥許多老成賢臣而任小人費仲惡來等，肆意殺虐。因之形成人民怨苦，內外叛離的現象，人人都想傾覆它而甘心。不過由於像孟子所說的殷室王朝國基的雄厚，當然不是像散沙似的一般人民所能推翻得倒的。

具有毫無義俠氣質和懷有濟世安民抱負的太公姜尚，他目覩當時朝政酷虐殘暴，斯民憔悴頓，在中原奔走數十年無所成就，今日與文王作傾心之談，所以他一見而就以釣魚的道理，勸他以自己的國家爲犧牲來取天下，以解救人民的痛苦，真可說是士逢知己，直抒胸臆了。不過當時的周國，乃是處於戎狄邊區一個蕞爾小國，地方不過百里，人口祇是十餘萬人

（註二九）。周之先世后稷，在堯舜時代曾爲農師之官，教導人民播種百穀，封於部（今陝西省武功縣）。至夏朝太康時代（紀元前二一八八年），后部的後人不窟，因不務農業而失官，西奔戎狄。其後嗣生活於戎狄之間歷千餘年而至文王（註三十），所以孟子稱文王爲「西夷之人」（註三一）。周國到了文王時代，還是如前面所述的那樣一個少國，文王就是這一小國的國君。殷室王朝雖然封文王爲西伯，那不過是加他一個西部諸侯首長的名義，授給他有討伐此一地區叛亂之權而已。太公與文王，要想以這樣的西周小國，起來傾覆殷室王朝，掃除暴政以解救人民，這是何等艱難之事，所以孟子說：「殷朝之王天下，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即由字）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註三一）。

我們就以上的全般情勢作一綜合觀察，就可發見太公與文王要想推翻殷室王朝，掃除暴政，乃是一種革命行動，而不是一般性的軍事戰爭。一般性的軍事戰爭，多是起於兩個國家間軍隊之行動，其勝敗祇是講求軍事戰略之運用即可。至於革命行動之戰爭，其起因多是由於國內之政治，因之必須講求特殊的革命戰略。

第二節 太公的革命戰略與六韜

前節已述明太公與文王想要以周國的力量爲基礎來推翻殷商王朝，革除殷紂暴政以解救人民，乃是一種革命的行動，革命行動，與一般性的軍事戰爭迥不相同。一般性的軍事戰爭，是兩個交戰國家間敵對行動，其範圍多局限於兩方的軍事方面。至於革命，乃是由於國內政治腐敗所引起。通常是由於少數的革命的志士仁人，憤王朝之暴政，憫人民之疾苦，諫阻無效起而作一種反抗的行動。其情勢與兩國交戰的情勢完全不同。我們現在就前節所述殷紂虐政和西周革命的情形再略爲敘述：紂王肆行淫虐，厚加賦稅以搜括民財；作炮烙之刑以罰罪囚。他納九侯之女，因女不喜淫蕩而殺之，並用鼎鑊烹九侯。鄂侯起而諫阻，紂王殺鄂侯而以其肉爲脯。文王聞而嘆嘆，紂王將其囚禁於羗里之城。文王之臣閔天等呈獻美女寶物與良馬，文王始得釋放回國（註三三）。殷臣辛申對紂王作七十五次之進諫，紂王不惟不聽，反加重責難，辛申遂逃而歸周（註三四）。太公姜尚，數諫不聽，因而逃往東海之濱（註三五）。由此可見文王太公辛申等，他們密謀以推翻殷商王朝，並非有意犯上作亂，實爲諫諍無效，別無挽救之方，祇有起而革命，以求掃除暴政，這實在是志士仁人苦心焦思之所作爲

，誠為不得已之舉。我們由此可知一個革命之初起，總是由於少數人士之領導，據彈丸之地與寡少之眾以為基礎。其與當時王朝勢力強弱之不相侔，無異以一敵百，以一敵千。因此指導革命戰爭之進行，不能依一般性的軍事原則為準據，而須採用一種特別的革命戰略，始能期望其成功。又革命是在王朝勢力下進行的。在王朝勢力下進行革命，隨時都有九侯之臨，鄂侯之脯，芥里之囚的危險，因之行動更須特加慎重。太公說：「鷺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有將動，必有愚色。」（註三六）這正是所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的時候，不可以常情常理相論也。我們現在細讀太公兵法各書，其中六韜一書，正是太公與文王武王（文王之子的名發，文王死後繼為西周國君與西伯之職）前後秘密討論傾覆商政的革命謀畫之談話紀錄，其中包括革命之戰略戰術，鉅細靡遺，而尤注重於武器與戰法之創新，以求出敵不意而戰勝敵人，於此可以想見太公當時謀慮之深遠。

革命既是以彈丸之地與寡少之眾為基礎，其成敗端視其所採用的革命戰略是否完密以為斷。所謂完密的革命戰略，自然是要經緯萬端，策籌千方。但扼要言之，則須具備以下的各點：

- 一、爭取全國人民心理之歸向，則可得到全國人民衷心之支持。即孟子所謂「得其民，得其心，斯得天下矣」之意。
- 二、培養自己的革命力量，則可支持艱苦的革命戰爭。
- 三、爭取各方的同情，則可與各方聯合作戰以擴大革命的勢力。
- 四、分散敵人的力量，與誘使敵人驕傲自肆和狂妄自大。前者可使敵我的強弱形勢互相轉換；後者可使敵人的戒備鬆懈，則我可出奇制勝之功。
- 五、在軍事方面，要研求以寡擊眾的軍事戰略以擊破敵人的優勢暴力。
- 六、革命戰爭，尤要在嚴守秘密，以免在革命力量未壯大以前為敵人所早期發覺而被其擊滅。

以上為革命戰爭戰略的要點。前四項為在革命戰爭發動以前對內對外對友對敵的準備工作；第五項為革命戰爭的實行工作；第六項為一般應守之原則。我們細讀太公六韜一書的思想內容和它的策畫程序，都是和這種原則相融合的。書中文韜一篇，為前述革命戰略之一二兩項。第一項爭取人民心理之歸向，為革命戰爭中最為重要之戰略。篇中文師、盈虛、國務

、大禮、明傳五章，都是為收攬人心而立言。文師立欵一段：「文王問：立欵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此為收攬人心之主旨，而其施諸行政，則賴君臣上下共同的努力。盈虛一章，是言君主須勤儉自律，率先躬行。國務一章，是言君主要以愛民為先。大禮一章，是言君主要在親民，臣下要在於無隱。而明傳一章，乃是文王在病中命太公給示太子發之箴言。其意是言君主持躬，必須時時警惕於「義勝慾則昌，慾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其次為培養革命實力，文韜篇中六守、守土、守國三章，即為培養國力而立言。六守章以仁義忠信勇謀六守為教民的要旨，發展農業工業商業三寶為富民之要旨。守土一章，是言團結人民，首在富民。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眾則敗。至於守國一章，則言君主施政，必須循天道以行，順四時以生，順天道則人民樂利而生活；順四時則萬物生長而富足。

革命以延攬人才為首要，而上賢、舉賢、賞罰三章為善用賢才之要點。上賢是言人才之鑑核；舉賢是言人才之善用；賞罰是言人才的獎懲的黜陟。

武韜篇為革命戰略中之三四兩項，即為對友對敵的準備事項。篇中發啟章為對敵戰略之總綱領。其內容分為以下之五段：首為揭示戰爭的目標；次為探討敵情；三為革命戰爭須以智謀取勝，使「全勝不鬥，大兵無創」，亦即以後孫子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之意，其方法在運用「天下皆有分肉之心」使各方並起而響應，組成聯合戰線而戰鬥，則革命勢力因而擴大；五為嚴守秘密，以免為敵人所偵知。文啓章是言對友邦之合作，須「因其政教，順其民俗」。蓋夏殷時代為氏族社會，成湯開國，封三千餘國。此三千餘國，各有其不同的歷史和習俗。現在和他們聯合作戰，不可干涉其內政，則大家必樂於從命。所謂「聖人故靜之。羣曲化直，變於形容。」就是順從各氏族國家的風俗習慣，而領導其趨向共同目標以作戰之意。順啓一章，是說做天下領袖的人，要有以天下為公的胸襟和容納

萬物的度量，纔能領導羣倫，成就偉大的事業。太公說：「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註三七）。」文王武王確能遵從太公的指教，聯合諸侯以克商；武王於克商有天下之後，分封諸侯一千二百餘國，使原來的各氏族國家，都能保有其原來的基業治理其氏族，實受了太公教誨的影響。以後太公的治理齊國。也是本着此種要旨，史稱其：「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之，齊遂為大國。」（註三八）也就是太公無為而治，以領導羣倫的實際續效。

武韜篇的文伐與三疑兩章，為革命戰略中的第四項，即為對敵人的謀略，具有高度機巧權變的內容。不過這兩章，一直為不諳軍事的一班宋明理學之士所詬病。他們認為文王、武王和太公都是聖人，絕不會做出這樣的機巧權變之事，因此懷疑六韜一書是戰國時代的策士們所偽作。不知太公和文王武王，乃是具有熱血的革命志士，不是矩行規步具有多烘頭腦的遺學先生。他們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殷紂的暴政以解救人民，自己的性命尚且可以犧牲，何況對於敵人。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酷，這是革命的人所當服膺的格言。而況施行謀略以促使敵人早日崩潰，則可縮短戰爭時間而使人民減少流離塗炭之苦，正是志士仁人不得已之所作為，我們切不可用宋襄公那種「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的婦人仁的眼光來加以論評的。司馬法仁本篇說：「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用權，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安其民，攻之可也。」這就是說治理國家，是以仁愛為本，以義治之，是為正道。用正道而不能達成時，則用權變。所以如果殺一人可以使人民安樂，則殺之可也。攻其國而可以使其人民安樂，則攻其國可也。所以以解救人民疾苦為職志的革命人士，他們是不諱言使用權變和謀略的。觀於太公和武王，他們於克商革命完成之後，即刻施行釋無辜之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救濟人民的仁政，使人民實受其惠。那末在革命行動之前施行權變與謀略，以促使殷紂王朝之迅速崩潰，又何損於太公文王武王之為聖人呢。

武韜篇文伐與三疑兩章，內容多有相同之處，而詳略稍異。此乃由於兩次談話時間的不同，一次是對文王而另一次則對武王而談。史官將兩次記錄並存而加以保管，正可證明六韜一書確係當時的談話記錄所寫成，不是後人所偽造。由於太公之頻頻提出謀略問題來討論，我們就可知道使用

權變和謀略，對於當時傾商革命的重要性。

以上論文韜武韜兩篇，是前述革命戰略的前四項，是革命行動前的準備工作。而後面的龍虎豹犬四篇，乃是革命戰略的第五項，即為革命戰爭的軍事原則。革命戰爭之能否成功，端視在革命戰爭中能否將敵人的武力擊敗獲得軍事的勝利而定。如果革命武力不能將敵人的武力擊敗。則一切努力均屬徒勞。所以革命的各種準備工作固屬緊要，而軍事戰爭之勝敗，尤為革命成敗所關的最為重要之事。我們由此可知革命之進行，雖屬頭緒萬端，而要以尋求軍事勝利為其最高策畫的重心。

其次，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和一般性的軍事戰略戰術，都是屬於軍事性的原則，所以並無重大的差別。因此，六韜書中之龍虎豹犬四篇，大致是和一般性的戰略戰術原則相同的。也就因此之故，一般人都認為六韜是一種普通軍事典籍，和孫武吳起之書作等量齊觀。其實孫吳之書，不過是普通將帥用兵之學，而六韜乃是革命領袖創國之學，即古代所謂帝王之學。我們看太公前面所說：「大蓋天下，信蓋天下，仁蓋天下，恩蓋天下，權蓋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此種聯合諸侯而統治萬國的規模，的確不是孫武吳起之書所能比擬得上的。

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和一般性軍事戰略戰術相比，其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戰爭的戰略是特別要求以寡擊衆，以弱擊強的戰略。因為革命力量多是起於彈丸之地，寡少之衆，要與強大的王朝勢力相抗衡，而革命的成敗，決於軍事戰爭的勝敗。譬如周國與殷商王朝之戰，周國的兵力祇有四萬五千人，而殷紂可以徵集諸侯之兵數十萬至百萬之衆，以如此衆寡懸殊的形勢，假使沒有新的戰略和新的武器特然出現於戰場，這是很難成功的。所以對於新戰略和新武器的研求，乃為太公與文王武王所日夜苦心焦慮之事。自然紂王之兵既如此衆多，自必佈成橫正面的橫陣以包圍敵人。太公要以寡少的周兵擊破紂兵，若採取與紂兵同樣的舊式橫陣，則因衆寡懸殊，勢必被優勢的紂兵包圍而被擊敗。太公於是創出一種新的「一」字戰法。所謂一者，乃是統一兵力使用於一點之意，簡言之，即是「一點突破」的戰略。原來舊式橫陣的部署，是將全部兵力平均分佈於橫陣的正面上，則其陣線上之各部份，當然沒有甚多的兵力。我方若以我之全力佈成前後重疊的縱深隊形攻擊其一點，則在此一點上敵我兵力之對比，就形成我

衆敵寡的形勢。這就是所謂「局部優勢的造成」，而爲我突破敵陣的好機會。以後孫子就以此種思想寫成虛實篇說：「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這裏所謂形人而我無形，就是說使敵人擺出一定形態的陣形，而我則不擺一定形態的陣形而統一靈活使用的意思。以上爲突破戰略部署的要領。其次，在戰場上的情況是瞬息萬變的，我方若採取此種突破的戰略，必須以迅速的行動與猛烈的進攻始能成功。所以在六韜書中武王屢次提出敵強我弱的問題，太公總是以此爲對。現在我們在六韜書中，就可發見太公的進攻要則，可簡括爲「一」、「活」、「疾」、「烈」四項，細述之則如下：

一：爲統一、齊一、專一之意。統一則兵力不分散；齊一則可發揮全體的戰力；專一則兵力集中專向一個目標。太公說：「凡兵之道，莫過於

一。一者能獨往獨來。」（註三九）。

活：爲活潑與靈活運用之意。太公說：「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又說：「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註四十）。

疾：爲迅速之意。

烈：爲猛烈之意。太公說：「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註四一）。

太公新創此種一點突破戰略，是用一、活、疾、烈四項要領而實施，但其最要，則在窺察戰機與把握戰機的「活」字。因此太公又提出「十四變」和「八勝」以爲窺察戰機之準則。太公所提十四變：「敵人新集（尚未佈陣之意）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註四二）至於八勝：「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突入之意）之；旌旂擾亂，人馬駭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戰於易（平易之意）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宿營之意），三軍恐懼，即陷之。」（註四三）以後牧野之戰（武王伐紂之戰），太公即是掌握十四變之首項與八勝之首項，即乘敵人之新集，尚未佈陣成列之際，加以攻擊而獲勝利。

以一點突破的戰略來攻擊橫廣正面的橫陣，自爲以寡擊衆最爲良好之

戰略。但其成功與否，則視能否突破敵之陣線而定。因爲採取橫廣正面的橫陣，就是所謂「長蛇陣」，如果不能將其中間突破，截爲兩段，則其首尾相應的包圍，可將攻擊者殲滅於其中。前面已述及要衝破敵陣，必須要疾與烈，就是要加強衝擊的速度和殺傷力。在古代的戰場，兩軍的陣線相距約有一二里之遙，此時如憑人力奔跑，其速度終屬有限。太公於是乃創造出下列六種衝擊的戎車（即戰車）以爲突破敵陣之用：

一、武衛大扶胥（戎車之名）三十六乘，四馬駢轡，有防楯，立旂鼓，以衝擊隊指揮官之指揮車。

二、矛戟扶胥七十二乘，裝備和護衛與前車相同，不設旂鼓，主以矛戟殺傷敵人。

三、小楯扶胥一百四十四乘，兩馬駢駕，裝備和護衛與前車同，其任務亦相同。

四、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裝備和護衛與前相同，主在以連弩發箭以殺傷敵人。

五、衝車大扶胥三十六乘，裝備和護衛與前車相同，車上載奮擊螳螂武士，爲奮擊搏鬥之用。

六、矛戟輕車扶胥一百六十乘，載螳螂武士爲奮擊之用（註四四）。

以上共爲衝擊戎車四百八十四乘，可以分編爲三十六個衝擊隊，齊頭或重疊衝入敵陣，而以密集的步兵部隊隨後跟入。此種新武器和新戰法之突然出現於戰場，自然不是敵人的橫陣所能抵擋，因之即以完成突破敵陣之功而獲得戰爭之勝利。

以上爲六韜一書結構的主要內容，我們由此可以窺見太公與文王武王所密商的傾商革命之戰略戰術，以及創造新武器和新戰略的全部輪廓。

第三節 太公革命戰略的實施

現在我們就六韜一書太公所定的革命戰略和當時歷史的事實作一對照。革命戰爭，以爭取人民心理之歸向爲第一要義，其方法爲修德、下賢和愛民。愛民，以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爲主旨。周族爲中國農業發達最早之民族，其先祖后稷在堯舜時代爲農師之官，教人民種植百穀，其子孫世守其業。而西岐地方爲渭河、汧水、津水合流的河谷，土地肥沃而灌溉便利。太公以勿奪民時，助其耕作，因之農糧之產豐足。詩經稱：「周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載芟章：「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有略其相，傲載南畝。厭厭其苗，蘇蘇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音咨，露堆之意）。」（註四六）這都是歌詠文王武王時代官員幫助人民勤勞耕作和農產之豐盛。人民因此豐衣足食，樂愛其君主。至於所謂下賢，就是禮迎天下之賢士。文王迎伯夷於北海之濱（伯夷爲孤竹國君之子，孤竹國在今河北省懷縣一帶）（註四七）；迎饒於荆蠻（饒爲楚國之君），奉之爲師。對於由各國來歸的諸酋長如太顛、閔夭、散宜生、辛甲諸人，都加以重用。中原諸侯，遂有背殷向周的趨向。孔子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註四八）就是指這種情形而言。史記亦載「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計謀居多。」以後到了殷紂王三十一年（紀元前一二四四年）周武王在盟津觀兵之時，諸侯不期而來會者八百餘國，皆背紂而向周。他們都說「紂可伐也」（註四九）。到了殷紂三十三年（紀元前一二二二年）武王伐紂牧野（在殷都朝歌西南，今河南省淇縣西南）之戰時，周兵雖祇有戎車三百餘乘，甲士四萬五千人，而各方諸侯以及庸、蜀、羌、髳、微、瀘、彭、濮各部族之來參戰者共有數倍之衆，可見太公此項政策之施行，收到了極大的功效。至於其對敵人之謀略，太公於文伐三疑兩章言之甚詳。文王武王依此進行，卒使殷紂王朝中，舊臣與新人對立；貴族與王室紛爭；紂王之荒淫驕縱，信恃天命所在，毫無悔改之意；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啓懼禍而逃亡，太師少師攜帶殷室宗廟祭器逃而奔周，遂造成殷廷內部上下猜疑恐懼，互相傾軋鬥殺之局（註五〇）。至於在軍事方面的準備，太公是着重於新武器衝擊戎車的製造。因爲周武王革命之成功，決於牧野戰鬥之勝敗。而牧野戰之能擊破戎軍，全在於衝擊戎車之突破敵陣，足見此項戎車製造之重要性。至於在殷紂方面：我國考古人員，曾於二十餘年前在小屯殷墟發掘一座殷代帝王墓壙中，發見一輛殉葬的兩馬駢駕軍車遺物，車上有御者和甲士的遺骸；車前有兩馬駢駕的殘骨（註五一）。我們又在甲骨文編馬字部裏，發見祇有兩馬駢駕的「驪」字，而沒三馬駢駕和四馬駢駕的驂字和駟字（註五二）。由此可以想見殷商時代的車輛，祇有兩馬駢駕或一馬繫駕，而沒有三馬駢駕或四馬駢駕的車輛。又在此殉葬的車輛上，只有乘員的座位而沒有其他的防衛設備，可見

此種車輛，乃是殷代帝王隨扈甲士的乘車，而不是用於戰鬥的戰鬥車輛。又在牧野之戰時，史載殷紂聞武王來，乃發兵七十萬人，此外並無車輛之記載，足見紂兵爲徒步之兵。字典上駟之一字，爲四馬駢駕之車馬，在我國歷史上首次出現於詩經大雅篇之大明章。詩裏說：「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驪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朱熹註：洋洋，廣大之貌；檀，係堅木宜爲車；煌煌，鮮明也；駟，謂四馬駢駕；驪，謂赤馬而白腹；彭彭，強盛之貌；鷹揚，謂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之意；肆，縱兵之意。足見四馬駢駕之戎車，爲太公所創製，在牧野之戰首次使用於戰場。而六韜書上所載，車上尚有武衛、武翼、大楯、小楯之武裝。大抵所謂武衛武翼，乃車上之傘；而大楯小楯是指車側之防楯。由此可知太公所創製之戎車，乃係四馬駢駕且具有武裝的戰車。至於此種戎車之速度和衝力，可由論語書裏子貢對棘子成說：「惜哉，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註五三）一語可以見之，可見當時以駟馬爲最快速之物。牧野之戰，史記載「以大卒馳帝紂師」，史記正義說：「大卒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即太公以戎車三百五十乘爲前鋒，甲士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爲後隊，迅速衝入殷紂七十萬徒步兵所列之橫陣內，殲殺其中軍主帥，使紂王之兵驚惶無主，遂自相踐踏，造成血流漂杵的慘敗。前詩所引，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足見此一戰爭，乃是太公親自指揮，用極快的速度衝入敵陣而獲得勝利，時太公已是九十歲的高齡了。我們要瞭解，在殷商交替的時代，我國的文化還是在青銅器的時代，以青銅器的工具，來製造此種四駢六轡（註五四）能在戰場上馳驅的衝擊戎車，却不是容易的事。總之，製造並使用此種成隊戎車以行突破以寡擊衆的戰略，乃爲太公所新創，更進而言之，太公實爲世界古今中外的戰史上以新武器突破敵陣而獲得勝利的第一人。

太公既以成隊的戎車作戰而獲勝，戎車就成爲以後周代軍事上主要兵種。詩經小雅大雅各篇中，有許多詠歌四牡六轡戎車之詩篇，都是讚頌成康、穆、宣各王開拓疆土之武功；至春秋時代，則以戎車乘數爲計算兵力之標準，實皆遵循太公創制之規模也。

牧野之戰，紂軍既潰敗，紂王乃奔回殷都鹿臺王宮，自己舉火自焚而死，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

武王既克商，於是首先革除紂王的暴政與天下人民從新做起，釋放監

獄內無辜的囚犯；散發鹿臺王宮裏所積聚的財富和鉅橋所藏儲的積粟以救濟人民；一面釋放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揚商容的門閭以尊禮忠臣賢士；一面封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爲諸侯，以奉祀殷室的宗廟和治理殷民，並以王弟管叔鮮、蔡叔度爲祿父之相以監督之。於是武王罷兵西歸，放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偃武修文以示天下不再用兵。史記稱武王之克殷紂，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足見太公不僅爲文王武王籌謀革命，勝殷紂，而且也幫助武王施仁政，解民困，以達成其終身奔走革命以掃除暴政的目的。

我們讀完了這一段繁細而冗長的歷史事實，就可知道太公和文王武王，他們以西周最爾小國，起來革根深蒂固的殷商王朝的命，而紂王又是一位殘忍好殺的暴君。他們在這種險惡的情勢下，艱苦的策畫和默默的工作，操心危而慮患深，歷時一十七年纔能達成其除暴政救民的目的，這是何等艱難的事。這可說是他們長期艱苦努力的成果。但是到了後來，一班不諳軍事的宋明理學之士，他們不深入研究歷史事實和當時的形勢，他們無視於太公和文王們的艱苦工作，而一口咬定說文王武王都是聖人，聖人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因此他們說：「文王聖人也。武王以聖繼聖，順天應人。」（註五五）他們是說文王武王是順應天命而得天下，不是由於艱苦努力中得來，說得如此輕鬆容易。他們甚至有說：「武王不得太公，而用周公召公闕天散宜生行師，紂之師徒亦必倒戈。」（註五五）他們都忘却了史書所載：文王之遇太公，即說吾太公望子久矣，遂拜以爲師；武王且尊太公爲父，號曰師尚父；史記稱武王之克殷紂，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之謀居多；而武王之分封功臣，也是以太公爲首功等這些事實，而忽視太公在周股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因此他們就說太公所著六韜三略等書都是後人的僞作，而無一讀的價值，這真是睜着眼睛說瞎話，厚厚的誣贖前賢了。現在我們對於這段歷史事實已經作了精詳的考證，證明當時的史實，是和六韜書裏所策畫的完全相同，因此可斷定以上各書確係由太公的言論記錄所編寫而成。不是後人所僞造。則對於尊崇太公兵法的讀者們，不但廓清了他們多年來心中真僞難分的迷惑，而且將更益增加他們對太公兵法傾慕嚮往的心情，和服膺揣摩的興趣。至於六韜書中有些粗率的言辭和淺俚的語句，如「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聖人守此而萬

物化」這些話，一向爲那些文人學士們所詬病，認爲是粗魯狂誕之言，不是像太公文王等有道之士所應說。我們仔細加以體會，這些話正是像太公這樣一生奔走革命而具有豪放氣質的人所吐露的抱負，絕不是一般尋章摘句的文學之士或是戰國策士們所能摹仿得來的，因此我們可以確信這些都是太公之所言。其他關於書中有些漏誤錯簡之處，以致難以讀解。那是由於年代久遠，文字書法和語言的迭次變遷所造成，我們不可爲此而因噎廢食也。

第四節 太公著述的流傳

綜觀太公美尚的一生，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具有豪邁義俠的胸襟而且具有濟世安民抱負的革命志士。他博學多才，豪放不羈。尉繚子裏說他屠牛朝歌，賣食盟津，人人以爲狂夫；而孟子也稱太公者天下之大老也，足見太公於未去西周以前，在中原各處必有許多個儻教時的言論。可惜那時沒有良好的書寫工具爲之記錄，到現在已是無可考證了。自從他在七十二歲西入西岐，一直到他死亡，一共有五十餘年之久。在這段時間內，在周國或在齊國，都設有左右史官爲他記言記事，他的言論纔流傳於後世。前面已述及班固所著漢書藝文志裏載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內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同志另有周史六弢六編列於儒家。隋書經籍志兵家類，却祇有太公六韜五卷、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陰符經一卷、太公兵法六卷、黃石公太公三略三卷，而沒有漢志所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考太公之在周國，前後共一十八年，其言論多爲與文王武王密商傾覆殷紂的革命謀畫和用兵，記錄下來可能就是漢志所載的謀八十一篇和兵八十五篇。武王克商以後，太公以首席功臣的地位被封爲齊國的國君，在那時太公已是九十餘歲的高齡了。從此時起到他的死亡，一共有四十餘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他於處理軍務政務之餘，對於他的臣僚自然也有許多言論，但是因爲他年事已高，可能祇有片段的言論，記錄下來就成爲漢志所載的言七十一篇。以上太公所作的言論，在周室的自然由周室的史官處理和保管；在齊國的則由齊國的史官處理和保管。在那個時代裏鐵器還未發明，文字的書寫工作極爲困難，所以一切文獻的記錄，都是用文字記錄和口頭傳授相輔而行。此種情形，我們已在前章裏引述殷代的甲骨文和竹書紀年的簡單記錄時已說明了。一個史官，既要擔任文字記錄，又要擔任對後輩的口頭傳授，所以要選用素質極高的人來擔任此種職位。在春秋時代，楚靈王

對右尹子革論左史倚相之爲人，他說：「倚相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由此可見在那個時代裏史官素質之優良。又史官所保管的文獻和史料是不許他人閱讀的，尤其像太公和文王武王密商傾覆殷紂的革命謀畫，更是密藏於史官的密藏中不許與他人接觸，所以在一國內除君主和宰輔外，史官是唯一知道國家機密的人。史官既要擔任此種國家機密文件的記錄和保管，又要擔任此種文件之口授解釋，所以在古代都是父子相傳，世守其職。譬如周文王的史官太史編，他的祖先太史嚳，就爲堯舜時代的史官；漢代的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相繼爲太史令；劉向和劉歆，父子相繼爲中壘校尉領校秘書；班固爲蘭臺令史，繼其父班彪完成漢書之著作，都是史官世職的實例。

由於春秋時代鐵器的發明和刀筆的使用，文字的書寫工作大爲進步，於是大家都想將古代所留傳下來的文字記錄和口傳資料，寫成完整的典籍，所以孔子就在此一時代裏寫成了詩、書、易、禮和春秋。至於太公所留傳下來的言論記錄，自然是由周室和齊國的史官分別來整理完成。漢書藝文志裏所載周史這個人，顏師古說他是周惠王襄王時代的人，一說是周顯王時代的人，由於前段所說的史官情形來看，周史能將太公和文王武王所密商的事件寫成六弢這部書，可以推斷他一定是周室王朝裏保管此一部份史料的史官。由此也可推想到他的先世也是周室的史官，在西周大戎之亂時抱着這份寶藏而東遷的，所以能使此種機密文件完整而不殘缺。我們從六韜一書的內容來看，除其前面文韜武韜兩篇是討論政治、經濟、心理和謀略的理論外，其餘都是討論軍事的。因此我們可以斷定這部書是由太公的兵八十五篇整編而成。周史可能先將太公的兵八十五篇根據原有的史料完整寫出，然後刪去繁瑣和重複的部份編成有完整體系的六弢。所以在漢書藝文志裏是兩書並存的，到了後來，因兩書內容相同，而後者體系更爲完整，受讀者的重視，前者遂致佚無存了。至於太公的諜八十一篇，可能由周室另一位史官整理寫成的。諜是深謀的謀略，可能爲以後寫成陰符經的基礎而爲後來戰國時代縱橫家之祖。戰國策秦策篇說：「蘇秦夜發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諜，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這裏在太公陰符之下加一諜字，足見與太公諜八十一篇有關，或者就是其中的一部份。蘇秦的這部書是得自鬼谷子的。那末鬼子谷又從何處得到此種太公的秘籍呢？由此可推想鬼谷子也是周室王朝裏一位史官，或者就是整理這諜八十一

篇的史官或是他的後人。所以在漢書藝文志裏，祇有太公諜八十一篇而沒有陰符經。到了隋代，隋書經籍志裏却分爲太公陰諜一卷和陰符經一卷的兩部份，而沒有整的諜八十一篇了。至於太公在齊國的言論，自然是由齊國的史官來整理寫定，寫定後，前面已說過，可能就是漢志所載的言七十一篇。這太公的言七十一篇，依以下的情形推斷，可能爲後來黃石公寫三略一書的基礎。因爲我們細讀三略一書，其內容並無有系統的組織和章節畫分，想係太公在齊國時隨時對臣下的提示，故可斷定其爲由言七十一篇改寫而成。至於黃石公，是一個隱姓埋名的人。他爲何要隱姓埋名，我們以後再討論。但在他的隱姓埋名中却透露了一個消息，就是他於下邳城（今江蘇省邳縣）圯橋上授太公兵法給張良的時候，他對張良說：「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十三年，張良從漢高帝過濟北，果真見到穀城山下有一塊黃石，因取此石而爲之立廟奉祀。黃石公之名，就是因爲這塊黃石而得名。太史公司馬遷疑心這位在圯橋上授書的老人是鬼神的幻形。他說：「學者多言無鬼神，至如留侯（即張良）因封爲侯食邑於留（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註五六）其實這是司馬遷沒有詳細研究之故。授書者告知張良說穀城山下有一塊黃石，以後張良果真在穀城山下找到這塊石頭，可見授書者對於穀城山的地形非常熟悉。穀城山又名黃山，在今山東省東阿縣東北，是標高不到一二百公尺的一個小丘阜。山東省境內的名勝之地甚多，如泰山、梁父、芸芸、亭亭等名山，都是古代帝王封禪祭祀之地；而穀城山不過是一個小丘阜。授書人之能熟知此山之地形，當然不是由於遊覽觀光或是拜神求仙而得知，而是由於從小就生長於此一地區或是常到此地遊玩之故。因此可推斷授書人的家就在在穀城山附近，就此我們可以知道授書人是齊國人。秦滅六國，滅齊最後。齊國的滅亡，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紀元前二二一年）。張良之狙擊秦始皇於博浪沙（在今河南省陽武縣東南），是在始皇二十九年；圯上老人授書，約在始皇三十年，距齊國之亡不過四年。又因授書人能寫出太公三略這樣一部書，他一定是曾經接觸過齊國史官所密藏的太公史料的，因此可推斷出授書人乃是齊國的一位官員，而且是一位史官。史官是世職的，所以他的先世也是齊國的史官，而且可能就是那個整理和寫定言七十一篇的人。我們由此可以推想授書人的先世，最先整理和寫定那言七十一篇，完成他做史官的職責。隨後因爲太公是開創周朝和開創齊國的聖人，他的言

論爲各方所宗仰，因而就私下的將它刪編成爲三略一書，密藏於史官秘府或自己的家中。六國既爲秦始皇所併滅，這些被併滅國家的遺臣故老，自然個個都想恢復故國，還我河山，但是懼於秦朝的暴政，都不敢有所行動。現在聽到韓國青年張良，他散家財、求力士，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這樣一種驚天動地的行動，自然引起那些故臣遺老的敬仰。所以授書人就這把這部寶書私下送給張良，並且說：「讀之可爲帝王之師。」授書人既然是齊國亡國的官員，他的行動自然還是受着秦朝官吏的監視。而且那時候正是秦始皇聲威最高，厲行焚書的時候，一個史官偷偷的將太公的兵法送人，這是何等危險的事情。那末他隱姓埋名又何足爲怪呢。以後張良輔佐漢高祖平定天下，以得益於此書爲多。張良死後，此書藏於良之棺中而消失。一直到了晉代八王之亂時（紀元四世紀初年），匪盜發掘張良墳墓盜取財物，於其玉枕中得此書，因之三略一書再次出現於世上。所以在漢書藝文志裏，祇有太公言七十一篇而沒有三略，最近在山東臨沂縣漢墓中所出土的竹簡，也是祇有六韜而無三略；到了晉代以後的隋代，隋書經籍志裏祇有三略，而太公言七十一篇則已亡佚無存了。

寫作六韜三略的周史和黃石公，以及傳授陰符經的鬼谷子，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而他們却能夠寫出那樣高深的兵學典籍，其爲典藏此種秘密史料的史官，可說是毫無疑義之事。又歷來的史官，都有一種嚴格的法則，就是絕對不能將所典籍的史料轉告他人。因此我們可以推想，所謂周史鬼谷子等，都不是他們的真實姓名，而是一種假託的化名。黃石公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他的姓名，而是由我們因爲那塊黃石所加於他的名號。由於此一事實真相的發見，我們就可推想在戰國時代裏其他許多神秘人物，如尉繚子、鶡冠子等，他們在當時社會上都是沒有藉藉之名，也沒有建功立業的表現，但是他們都能撰著許多與兵學有關的典籍和教授許多門徒，而且都是用假託的化名出現，我們就可斷定他們一樣的都是曾經接觸過國家秘密史料的史官或是他們的後人。這樣一來，我們過去對於這一羣人物的神秘觀感，也就一掃而空，毫不爲怪了。

由於以上所述，可知六韜，三略和陰符經三部書，都是由太公的言論記錄編寫而成。他們都是自稱爲「太公兵法」或是「太公陰符之謀」，也確實是事實，不是偽造假託之言。不僅如此，我們讀了在春秋戰國時代所後出的孫子、吳子、鶡冠子、尉繚子，以及蘇秦張儀等有關於兵學與縱橫學

的許多著述，細考其內容，可說是多少都受了太公言論的影響。所以太史公司馬遷說：「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註五七）確爲確實有據之言，並非過譽溢美之辭。

結 語

我們追溯我國五千餘年來最古的文化，其信而有徵的，當推堯舜的文化和太公姜尚的武略。有文治，足以使人民生活有物有則，以進於懿德（註五八）；有武略，足以征討亂逆，安綏地方，使人民得以安居而樂業（註五九）。易經稱古代庖犧氏弦木爲弧，刻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註六〇）。詩經大雅篇說：「修爾車馬戎兵，用戒戎作，用邊（音惕遠也）蠻方。」又說：「式遏（阻止之意）寇虐，無俾民憂。」（註六一）足見我國古代主政之人，對於文治與武事，兩者都是並重的，所以能開疆拓土，樹立我中華民族生存繁衍的基礎，堯舜的文治，經孔子孟子的祖述，和數千年來儒士學人的發揚光大，蔚然已成爲我國文化的主流。至於太公的武略，往往因國家長治久安，太平無事，而爲全國上下所忽視。因而循致戎事不修，武備廢弛，最後召來外族侵略，演成亡國覆宗的慘禍，這實在是我們民族一件最可悲哀的事。我們現在細讀太公所著兵法六韜三略各書，仔細分析其內容，他以天下爲天下人之天下，大公無私的精神來規畫國家的政治，規模非常弘大。他說：「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夏道長，秋道斂，冬道藏，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註六二）又如前面所說的大蓋天下，信蓋天下，仁蓋天下，恩蓋天下，權蓋天下等。他是以天地孳生萬物的道理和民胞物與的精神來治理天下的人，其政治思想的弘大，實爲古往今來聖賢豪傑所共同追求的目標。他的政治規畫，是以愛民富民教民的順序依次進行，同樣也是古往今來聖賢豪傑所步趨追隨的規範。至於他在軍事方面，他衡量了當時殷周兩方衆寡強弱的形勢，首着眼於新武器和新戰略的創造，以求在戰場上出敵不意而戰勝敵人。他在以銅器爲工具的時代裏能創造出四馬駢駕的快速戎車，衝破殷約以七十萬衆所列的橫陣而獲得曠古未有的勝利。他不但在軍事方面能克敵制勝，而且於軍事勝利掃除殷紂暴政後。他不但行仁政於人民以達成其愛民救民的抱負和夙願。凡此種種，可說是都是古往今來的聖賢豪傑所難以企及的。伊尹周公，有弘大的政治的抱負和才能，而缺乏軍

事的素養。管仲樂毅，有軍事的素養，而缺乏弘大的政治抱負和才能。兩者兼備而能施展德澤於天下的，古往今來，實以太公爲第一人。

孟子書裏說：「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鄭國兩條小河）。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註六三）孟子又說：「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註六四）孟子之意，是說人君雖有仁惠的存心，假使不依照先王的施政方法去實行，人民並不能得到仁惠的德澤。可見有仁義的存心和愛民的抱負，必須要有施政的方法始能達成。六韜一書，就是太公和文王武王以仁政愛民，以武略治軍施行革命以推翻殷紂暴政的實際記錄，也就是孟子所謂先王施政之實際方法。

我們現在離太公的時代雖已久遠，形勢也是古今不同，但太公的政治思想和其軍事智慧，實是恆久不渝，萬古常新。他的名言實訓，到現在仍舊可爲我們極可寶貴而可遵循的準則。方今世局紛擾，變亂日急。共產主義，有侵略世界的陰謀；核子炸彈，有毀滅全球的威脅，保衛民族的生存，必須要如太公六韜所規畫的內修仁政，外治武備。這裏所謂內修仁政外治武備，若用現代話說，就是要準備政治和軍事聯爲一體的全民總體性戰爭。而太公六韜一書，正是我國古代研討政治和軍事聯爲一體的惟一兵學典籍。所以要研究現代的全民總體性戰爭，若先研讀太公的六韜，當可獲得無限寶貴的啓示。

綜觀太公六韜一書，實爲古代帝王創國之學。在全書文字上，雖有些近於粗豪簡率，然其含義奧深，自古以來，能充分讀解者甚少其人。管仲取其六守三寶之政制與農器一章之要旨，即以開創齊國之霸業；孫武擬其機勢奇正之運用，著爲兵學之典範。余細讀全書之內容，彼將經營國家與決勝疆場萬端之事，縮寫於萬言尺素之中。「利天下者天下歸之」，一語就決定殷周兩代興亡之局。真是如羅陳泰岳華嶽於几案之上，運籌國運於指顧之間。自古以來，其治政治軍之道，乘機決勝之策，實未有能超過之者。後世儒生，未能深體其中奧義，妄肆批評，譏爲鄙俚野人之言，斥爲後人僞作，致將本書列爲兵學七書之末，視爲無足輕重。誠不免昧於於至道之言，厚厚的誣衊前賢了。不過，我們如果從另一方面來看：像太公那樣在本書中所籌謀的革命創國之事，從外形上看，是與一般性的造反與謀叛之事有其相似之處，此當爲歷代專制帝王所痛深惡絕之事。是則本書之得以倖免於專制帝王毀版禁絕之災，而能流傳至於今世，實有賴於諸儒詆

毀蔑視之功。毀之適足以成之，天下竟有如此奇巧之事，是又爲詆譏諸儒始料所不及。吾人今日能讀到此書，猶應感謝諸儒維護之力也。全書校譯既畢，因略述粗率管窺之見，深望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註釋

- 註一：見史記五帝本紀。
- 註二：見易經繫辭下傳。
- 註三：見左傳魯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論左史倚相說：「倚相，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 註四：見清孫海波著甲骨文編序文。
- 註五：見晉書束皙傳及清崔萬烜竹書紀年序文。
- 註六：見敦煌石室考古記。
- 註七：見書經禹貢篇梁州條。
- 註八：見史記夏禹本紀。
- 註九：見唐柳宗元著封建論。
- 註十：見徐培根等著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一編二卷一章春秋時代之形勢。
- 註十一：見史記孔子世家。
- 註十二：見金文貝父辛卣。
- 註十三：見史記蕭丞相世家。
- 註十四：見徐培根等著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一編一卷一章中華民國之起源與發展。
- 註十五：見史記五帝本紀。
- 註十六：見董作賓著殷周戰史。
- 註十七：見班固著前漢書藝文志兵家類。
- 註十八：見新唐書侯君集傳末段。
- 註十九：見宋張商英素書序言。
- 註二十：見六韜武韜篇。
- 註二一：四嶽是堯舜時代四方面諸侯的首長，有協助帝王決定國家大事的權力。見尚書堯典篇。
- 註二二：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 註二三：見尉繚子武議篇。

註二四：見劉震愷著「虞山奇觀」一文，見中央月刊第六卷第八期一三三頁。

註二五：見史記吳泰伯世家。

註二六：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註二七：見孟子公孫丑上篇。

註二八：見史記殷本紀。

註二九：關於周國在西伯姬昌時代的人口數字，史無記載。我們就武王姬發伐殷牧野之戰時，周國出兵四萬五千人，若按古代遊牧民族之出兵率計算，當時周國的總人口約為十八萬至二十萬人。但太公歸周之年，早於牧野之戰十八年，所以當時周國的總人口，至多不會超過十五萬人。

註三十：見史記周本紀。

註三一：見孟子離婁下篇。

註三二：見孟子公孫丑上篇。

註三三：見史記殷本紀。

註三四：見史記周本紀太顛闕天穀宜生鬻子辛甲條司馬駟註解。

註三五：見尉繚子武議篇：太公望年七十餘諫其主不聽。又孟子說：太公遊紂於東海之濱。

註三六：見六韜武韜篇發啓章。

註三七：見六韜武韜篇順啓章。

註三八：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註三九：見六韜武韜篇兵道章。

註四十：見六韜龍韜篇軍勢章。

註四一：見六韜龍韜篇軍勢章。

註四二：見六韜大韜篇武鋒章。

註四三：見六韜大韜篇戰車章。

註四四：見六韜虎韜篇軍用章。

註四五：見詩經大雅篇縣縣章。

註四六：見詩經周頌篇豐年章載芟章。

註四七：見孟子離婁上篇。

註四八：見論語泰伯篇。

註四九：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註五十：見史記殷本紀。

註五一：見小屯殷墟考古發掘報告書。

註五二：見孫海波著甲骨文編第十卷馬字部。

註五三：見論語顏淵篇。

註五四：四駢六轡：四駢為四馬並齊駕車四匹馬的名稱。其位於中間兩匹馬在轅桿兩側的稱為服馬，在服馬外側的兩匹馬稱為驂馬。服馬係用單轡控馭，兩服馬共為兩轡。驂馬為車子轉向的轉軸或外翼，故每一驂馬須用雙轡控馭以引導其轉向。因之兩匹驂馬共有四轡，連同服馬兩轡，共為六轡，即為四駢六轡的解釋。

註五五：見楊家駱主篇偽書通考兵家類六韜節。

註五六：見史記留侯世家末段贊辭。

註五七：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註五八：見詩經大雅篇蒸民章：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自懿德。

註五九：見書經周官篇：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勿庭，綏厥兆民。

註六十：見易經繫辭下傳。

註六一：見詩經大雅篇抑抑章及民勞章。

註六二：見六韜文韜篇守國章。

註六三：見孟子離婁下篇。

註六四：見孟子離婁上篇。

